

滄海叢刊

哲學與思想

——胡秋原選集第二卷

胡秋原著



哲學 東大圖書公司

B0
H498



哲學與思想

胡秋原 著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09601167

哲學與思想：胡秋原選集第二卷／胡
秋原著.--初版.--臺北市：東大發
行：三民總經銷，民83
面； 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1547-5 (精裝)
ISBN 957-19-1548-8 (平裝)

1. 哲學-論文，講詞等

107

82009662

◎ 哲 學 與 思 想
— 胡秋原選集第二卷

著者 胡秋原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
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復興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六樓

重慶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一一〇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二月

編 號 E 10024

基本定價 伍元柒角捌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字第壹九七號



ISBN 957-19-1548-8 (平裝)

自序

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選集。我的文章，都是我的思想之表達，我想在此序中略述我的思想之由來與變化，以供閱者之一助。

一

自序

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我以亞洲大國迭遭列強侵略。鴉片戰爭以後，有英法聯軍以及俄國在東北強占我廣大領土，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至二十世紀第一年有八國聯軍，接著在此前後列強在中國畫分勢力範圍，進行瓜分。接著日俄兩帝在中國大戰，並自行處分中國領土。二十世紀以來，在日、俄、美三帝侵略、玩弄之下，中國人遭遇之悲慘，實全世界所未有。首先，日本自民國三年進兵山東至民國三十四年投降止，公然要「征服支那」，連續軍事進攻三十一年之久。除了濫肆屠殺、日夜轟炸、強姦婦女、掠奪物資文物之外，最慘極人間的是擄掠壯丁至日本為奴

工，及以中國抗日人士之人體作細菌戰試驗，然後對我作傷寒、霍亂及鼠疫之戰爭。

其次是蘇俄。俄國革命成立蘇聯後，宣言同情中國民族獨立之要求，放棄沙俄對華不平等條約。他是有其世界革命或世界征服之計畫，而想利用中國人為工具的。而苦於列強侵略的中國人喜其能以平等待我，視之為俠客或救星。雖然紅軍進據外蒙，他仍能成立中共為第三國際之支部，並使孫中山改組國民黨，行聯俄容共政策。國共分裂後，史達林力謀報復。除杜撰中國是「封建社會」之理論，要中共進行土地革命，然後在蘇聯無產階級領導下不經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外，又與日本勾結；其在西元一九二九年發動中東路戰爭，亦鼓勵了日本九一八之攻擊。及受德日軸心之威脅，乃一面片面將中東路賣與日本，一面對華高唱國共合作。抗戰之初，他對我確在空軍方面有所援助，然他在貿易上由我獲得許多廉價貴金屬，並使中共成立了兩個軍。以後並悄然兼併唐努烏梁海，利用新疆回漢衝突，迫盛世才與其訂立強取新疆權利密約多種。德蘇戰爭中，蘇聯大敗，盛世才將這些密約向中央報告，使史達林大為痛恨。及德軍在史達林格勒大敗，蘇俄即公開攻訐中國「作戰不力」，製造中俄緊張，為其大勒索之伏筆。一九四五年二月三巨頭雅爾達會議，除瓜分德國、東歐外，又有雅爾達密約，同意史達林恢復一九〇四年前帝俄在滿洲之權利以及外蒙獨立之要求，為其對日參戰之條件。原子彈降落在日本後，蘇俄對日宣戰，不費一彈占領東北。除搶劫強姦，公然劫走東北工業設備之外，又以所得日人武器武裝徒手進入東北之林彪部隊並加訓練，終於擊敗前往接收之國軍，並打出關外，奠定了中共在內戰中勝利之基礎。

沒有蘇聯的援助，不會有中共政權，這是中共與蘇聯都公開承認已久的。所謂援助，不僅是物質的、軍事的、外交的，尤其是精神的。這便是馬列主義與蘇聯所欽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共政權也是蘇聯進行冷戰的產物，甚至可說，列寧成立第三國際，即是蘇聯對西方諸帝冷戰之開始。中共政權成立之次年，史達林即要求其成立「抗美援朝志願軍」參加韓戰。除造成百餘萬的傷亡之外，尚須以米、麥、牛、羊送到蘇聯償還軍火債務，而這些軍火是德蘇戰爭中，美國援蘇軍火之剩餘，而中國老百姓則大批被迫吃草根、樹皮，乃至活活餓死。這引起中國人民對蘇聯的憤怒和對中共之不滿，而毛澤東則發動「反右運動」加以鎮壓。繼因進攻金門及對美作戰問題，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發生爭論，赫氏同意協助中共發展原子武器，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並給中共一座反應爐，同時對中共多方勒索。既而後悔，對原子計畫多方拖延，故意誤導，終於提出管理中共海軍要求，為中共拒絕，蘇聯乃廢止「國防新技術協定」，撤回所有蘇聯顧問，一時大陸工業陷於癱瘓狀態，甚至在一九六〇年已發生中俄邊境衝突。於是中共與蘇聯之十年蜜月告一結束，開始理論鬥爭。中國科學家之努力不僅恢復了工業上機械的運轉，而且在一九六四年原子試爆成功，並進而發展人造衛星。這使毛澤東貪天之功，自以為「天才」，發動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誅鋤異己，整個大陸陷入恐怖亂鬥之中。中共原子試爆之成功亦使蘇共恐懼和忌恨，屢動禍心，欲對中共核子設備進行核襲，加以摧毀。至是見大陸內鬥猛烈，遂發動珍寶島戰爭與塔城戰爭，以作試探。中共不僅強烈反擊，而且自此稱蘇聯為「新沙皇」和

「社會帝國主義者」了。於是尼克森乘機與中共勾結，而布列茲涅夫仍欲對中共進行核戰，希望美國同意。此事為季辛吉所拒。布氏又欲以傳統戰分裂中國之西北，於是蘇聯於一九七九年發動阿富汗戰爭，蓋欲由帕米爾進攻新疆。這使俄帝陷入泥沼，一如美帝之在越南（阿富汗游擊隊曾得中共與美國之援助亦公開之秘密）。布氏在其死前曾向中共表示和平之願望，然直到戈巴契夫上臺並於一九八九年到北京道歉，才開中俄關係之新紀元。

最後看看美國。在十九世紀歐洲諸帝侵略中國時期，美國雖享「利益均霑」的不平等條約之利益，但未曾（或尚無力）主動的進攻中國，加之還有蒲安臣以美國外交官於任滿後代中國出使各國訂立平等之條約，以及美國教士如林樂知等同情中國之言論，使中國人對美國另眼相看。實際上，美國對華政策有其高明處，而拙劣處更多。所謂高明如參加八國聯軍，同時發表門戶開放宣言；首先退還庚款，辦理教育，培養了許多中國菁英。所謂拙劣，他並無一個長期目標，如很多人所想像的。他只是臨時應付，而且是極現實的向強者讓步；而且中國對他的好感，反而增加他對中國人的優越感，認為中國人可廉價應付，隨意利用，結果不僅害到中國，也害到他自己。例如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他曾頻頻對日抗議，而終於訂立石井藍辛協定，承認日本在滿洲有其特權。華盛頓會議中他提出九國公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然僅空言，而無實際。九一八大變發生後，他曾大聲疾呼制裁日本，而僅以「不承認主義」而終。及日本發動盧溝橋戰爭，他還以中立法案中之「現款自運」條款供給日本以汽油、廢鐵之戰略物資，直到一九四一年始以五

千萬美元援華，較之援俄之天文數字，真九牛之一毛。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始承認中國為盟國。然以「歐洲第一」之故，對中國戰場僅以空運及十四航空隊維持中國軍隊之士氣，牽制日軍。他派來史迪威訓練新軍為援印之用，而不顧當時日本打通大陸走廊計畫（即所謂「一號作戰計畫」）下中國戰場上之危險。繼而又聽信太平洋學會之宣傳，要求中國將軍事指揮權交與史氏，此被中國拒絕，自不快於心。此時史達林正多方迎合羅斯福（如解散第三國際），而羅氏之子亦稱史達林為「約叔叔」。於是雅爾達會議。除瓜分德國、東歐而外，另有雅爾達密約，犧牲中國為蘇俄對日參戰之條件。羅斯福死，美國政府在羅氏皮包中發現此項文件，於六月間通知中國依照彼等密約，簽訂中蘇友好和平條約。這條約不僅使中國正式放棄外蒙，而也註定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和國民黨的失敗。戰後美國派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內戰。史達林、毛澤東均已成竹在胸，而國民黨猶不知其地位之險惡，以為半年內可以擊敗中共，而文武大官之貪污，使人心迅速喪失，加之無節制的通貨膨脹，只有加速其崩潰。民國三十八年初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政府遷廣州，四月，所派的和談代表為中共扣留。八月，美國發表「白皮書」，「勾消中國」，然猶希望「第三勢力」之出現，亦有占領臺灣之計畫。李宗仁飛美後，蔣總統復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美欲承認而不可得，始聲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共抗美援朝，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中共為「侵略者」，美國派軍事代表團來臺，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民國五十二年，甘迺廸曾欲與蘇聯共同空襲中共之核子試驗設備，為赫魯雪夫所拒，此事尚在蘇聯、美國商量核

自序

一 交與日本，「臺灣地位未定」。翌年，尼克森飛北京，發表上海公報。日本則迅速廢止中日和約，承認中共，而又派椎名來臺，要求繼續經濟交流。此時美國與中共還只有「連絡」關係。在「關係正常化」的口號下，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先期派人來臺通知「絕交」，而又由其國會通過其國內法之「臺灣關係法」為繼續利用及干涉臺灣之根據。到了一九九〇年，在柏林圍牆推倒後，東歐要獨立了，冷戰結束了，蘇聯也在崩潰中了。此時美國不僅認為中共已毫無利用價值，而且他還是冷戰的最佳新對象，因為過去對蘇聯冷戰所用的一套正好利用來對付中共，而臺灣這個地方大可利用，是對蘇冷戰中還沒有的。於是一方面以人權問題、軍售問題、奴工產品之貿易問題對中共施加壓力，支持達賴喇嘛與民運人士對中共攻訐，鼓勵英港政府製造糾紛，又鼓勵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諸國爭南海羣島主權。而對於臺灣，則他們早已製造理論，說臺灣民族與文化與大陸不同，鼓勵臺獨建立「全新而獨立的國家」，並勸國民黨進行「本土化」。民國七十七年以來，公開要求臺灣之「大陸熱」降溫，增加對臺軍售，尤其是鼓勵臺灣重新進聯合國為「政治實體」，而這也是有意刺激中共。一切的一切，可以總括為他們的一個口號：「拆散中國」，即不許中國統一、再建和復興。這是與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完全相同的。

這是我的時代中國的國際環境。

二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向為亞洲「上國」。一百五十年間英、法、帝俄、日本、德國以及二十世紀日本、蘇俄、美國的侵害和侮辱，當然要使中國人思考外患之由來，並研究救國之道。這是一百五十年來中國人思想和行動的主要動機。簡言之，這有下述之潮流。在鴉片戰爭之前夕，中國思想界有三派：一為漢學派（如阮元），二為宋學派（如方東樹），三是經世派，此可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基於他對漢代應付匈奴之策的研究，提出兩大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夷制夷」。開始以夷之「長技」在船砲，我們建設海軍。甲午一敗塗地，則又以為夷之「長技」是政法，乃有變法與革命之相爭。西太后在戊戌政變以後又閹下義和團與八國聯軍的大禍，國人絕望於清廷，乃有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之建立。而袁世凱以尊孔為名，進行帝制。於是有了「新文化運動」，即以夷人之技，無所不長，尤其是科學民主；而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之學根本不適於現代生活，應全部拋卻。此即後來之全盤西化運動。歐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西方列強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利，國人悲憤之中，爆發了偉大的五四運動。這是一中國全國性的國民運動。他喚起全國的愛國熱忱，也使中國政府拒絕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並且打

倒了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但如何外抗強權，不僅科學民主不能救急，而且當時西方列強都是袒日的。五四運動也使當世兩大勢力重視中國之將來。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然而僅止於空言。而革命之蘇俄，則列寧不斷派人來華連絡，宣言同情中國民族運動，並願放棄帝俄時代不平等條約。他除成立中國共產黨外，又單援孫中山先生使其改組國民黨，並行聯俄容共政策。其後雖在北伐中國共分裂，國民黨走向西化或美化，但俄化運動亦因國民黨聯俄容共與北伐而擴大基礎。俄化運動可說是認蘇俄共產主義才是「最新文化」，也可說是認為夷之長技在馬列。亦如毛澤東斬釘截鐵所說：「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無論西化派或俄化派，其原始動機皆出於救國之心，是毫無問題的。而結果是不僅都沒有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造成兩派之相爭和長期內戰，以及中國在美俄二超強之冷戰中之分裂；而且在世界冷戰終結後依然妨礙中國人之統一復興，形成中國之新的危險。

「以夷制夷」也造成可怕的後果。首先，李鴻章之以俄制日，幾乎造成瓜分之禍。民國以來，我們在外交上有聯日、聯美、聯俄諸派，其始亦出於「以夷制夷」之心，然國力不如人，先變為「依夷制夷」，繼而在外人利誘威脅及對西方文化與馬列主義之自卑感中，變為親日派或知日派，親美派或親俄派，而成為外國人「以華制華」之工具了。就此而言，經世派是失敗的。這原因不是經世之宗旨不正確，而在他們學問不足，只知憑一時所見的外人長處作為立國目標，既不研究夷人長技之由來，亦不研世界究形勢的實際。而智與力皆不如人，還想以夷制夷，是未免

太不度德量力了。

在這過程中，漢宋兩派如何呢？他們對西化、俄化兩大主流，有的表現了輔助作用，有的表現了糾正作用。康有為以漢學今文派宣傳變法，而章太炎則以古文經學贊揚革命。至新文化運動以後，胡適以漢學有他所了解的科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並一度贊成全盤西化。錢玄同則以科學方法就是疑古，且須廢止漢字。顧頡剛遂考證夏禹為蟲，否定古史。肯定中國文化與其相抗者，最早有梁漱溟、張君勸，繼而有馬一浮、熊十力。他們大抵據宋學立論，形成了現在的新儒學派。大體言之，他們是主張溝通中西文化的，也有傾向社會主義的。馮友蘭亦曾唱新理學，後來變為俄化派了。

三

自

序 一 9

我生於民國前二年，即一九一〇年。我生活的時代，是歐帝退卻，日本對我瘋狂進攻，蘇俄利用日本進攻而侵略，美國利用日俄侵略而侵略的時期。而國人救國思想，則是西化主義、俄化主義兩大潮流鬥爭，終使中國陷於內戰和分裂時期。我與我的前輩和同時的同胞一樣，一生日夜思考的是國家的出路。我也曾受二化主義的影響，但自始至終，我是反潮流者（民國以來除西化俄化兩大潮流外，還有一個短期的西化別派——法西斯潮流）。回想起來，原因有二：

一是思想的出發點。我少年時代記憶尚鮮之事，是五四運動傳到黃陂之時。我當時還是國小學生，老師們勉勵我們長大了要打倒日本。先父是當時全縣父老推舉出來的勸學所長，他在聖廟前面泮池的三面牆壁上將二十一條全文漆成拳大的字，使經過的人都要看看。民國十年，他創辦前川中學。這原是紀念二程的。但先父和我們的國文、歷史老師教同學們為人為學之模範，是明末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諸儒。先父每週一對同學訓話，要義是人格、學問為救國之本。反覆叮嚀的是人格修養、科學研究以及救國志氣三事。這三點，我曾在民國十三年《前川第一屆同學錄序》（我第一篇印刷文章）中加以簡述。多年來我在《中華雜誌》上所提倡的人格尊嚴、民族尊嚴、學問尊嚴實由於此。凡有背於三大尊嚴之義者，自為我不取。

二是研究和論證的方法。西化派、俄化派都是以一時中西文化之優劣勝敗，或者西方與蘇俄之一時情況或宣傳，作為自己立國的千秋大計。我認為中國出路問題應在人類長期歷史中看各民族發展的情形，世界文化進步的趨勢，了解自己的地位、需要和條件，決定自己努力的目標和論證趨於嚴密。在數十年讀書思考過程中，我的歷史哲學經過三期的變更：一九三一年《唯物史觀藝術論》及《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以來為先超越期；一九三五年及《歷史哲學概論》以後為超越前期；一九五三年我寫完《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時，我亦完成「理論歷史學」之格架，自是以來，為超越後期。茲略述三期變化情形如下：

①當初我原準備學習理工報國。在中學時，除對國、英、數、動、植、礦物學，物理、化學功

序

課用功外，也看課外書。當時學校定有北京、上海報紙，《東方》、《學生》等雜誌，北大、南高的《國學季刊》和其他出版物。我還由上海通信圖書館通信借看當時新出版物。此外又由《國語文類選等》書閱讀新文化運動早期文章。前川創辦之年，中共立黨，民國十三年我畢業之時，國民黨改組，孫中山先生北上，共黨小冊子和《三民主義》也到學校圖書館了。民國十四年我到武昌準備投考武昌大學之時，孫中山逝世，五卅慘案發生，《新青年》出版列寧紀念專號，整個空氣在變了。我考入武大後，先讀理預科。我忙於大代數、解析幾何習題、化學實驗，有暇仍看課外書。此時我已接受唯物史觀了。不久，北伐軍和國民政府來到。此時西化派刊物只有《現代評論》，而俄化派除了《新青年》、《嚮導》、《中國青年》之外，還有創造社之《洪水》等。然武漢政府在政治上，除了收回英租界使人心振奮之外，對內鬥爭亦漸起，甚至商店的店員也要對店主鬥爭，人心普遍不安。繼而有上海清黨，寧漢分裂，長沙馬日事變，武漢分共，南昌暴動，全國亦在大亂之中。這使我對政治發生惡感，此時武大沒有很好的理化教授，我開始看西方文學譯本，尤其是俄國文學，並且在民國十六年下學期進了中國文學系。此時我心中發生一個問題，如何以唯物史觀說明文藝思潮的變化？沒有人能答覆這個問題。後來看見《蘇俄文藝論戰》譯本，在其附錄一文中說到俄國樸列汗諾夫是首先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從此我記住這個名字。這年十二月半，武漢發生桂系軍人的恐怖，捕殺武大學生。我倖免於難，逃到上海進復旦大學中國文學

系。此時上海正是百家爭鳴之時。西化派有新月書店，異軍突起的俄化派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革命文學或普羅文學。我在《北新》雜誌上發表《革命文學問題》（這是我第一篇刊於全國性雜誌的文章），表示反對的意見。繼而我看到樸列汗諾夫《論原始社會藝術》的譯本，我寫了《文藝起源論》。但階級社會的藝術如何呢？我在內山書店看到樸氏的書數種，但看不懂。五三慘案後，我寫了《日本侵略下之滿蒙》和兩本關於民族運動的小書，得到一點稿費，便到東京。我曾說，我到日本是為了找樸列汗諾夫的。我學好日文之後，便蒐集所有樸列汗諾夫著作之日文、英文譯本及有關書籍寫《唯物史觀藝術論：樸列汗諾夫之研究》。至此我才知道樸列汗諾夫是「俄國馬克斯主義之父」，列寧等皆其後學。所謂有關書籍包括《馬克斯恩格斯全集》，自奧古斯丁、伊本·卡爾東以來的種種歷史哲學，藝術哲學和重要文學藝術作品。繼而我又譯了佛理采的《藝術社會學》。《唯物史觀藝術論》是我對我在民國十六年提出的問題（如何以唯物史觀說明文藝思潮之變遷）之解答，而寫完此書以後，我自覺我已有一個一貫的思想體系或哲學了，我自稱為「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並以此自喜。民國二十年友人王禮錫先生創辦《讀書雜誌》，我開始在上面講文藝史方法論，繼以我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由埃及開始，講世界文藝思潮的發展。那時在世界經濟大恐慌中，馬克斯主義大為流行。我所謂馬克斯主義主要指唯物史觀。我的馬克斯主義由樸列汗諾夫來，我從未接受列寧、史達林的馬克斯主義。

我在民國十九年初考入早稻田大學並補得官費。二十年暑假中我歸國省親，九月中旬到上海

已買好船票東渡繼續學業，而在上船前一天，九一八之訊震動世界了。我考慮了大半天，決定拋棄文憑和官費，留在上海賣文度日。我以稿費所得創辦《文化評論》，提倡反日。又痛感當時左翼作家聯盟把持文壇，唯國民黨以民族文學與其對抗，無黨派的自由個人幾無立足之地，我提倡文藝自由。當時在日寇進攻之下，國共仍在激戰之中，國民黨亦有寧粵之爭，一般人都焦慮中國之前途，或中國往何處去。先是國共分裂後，蘇俄即有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之論爭。他們要以此決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史達林派說中國是封建社會，所以要實行土地革命，然後在蘇聯無產階級領導下不經資本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但尚有資本主義說，亞洲生產方式說，不過被史達林壓迫下來了。《讀書雜誌》發起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引起廣泛的重視，王禮錫先生屢次催我表示意見。我說，我還要翻翻二十四史有關食貨資料。於是我才以我所謂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研究中國歷史。我提出「專制主義論」，即秦漢以來之中國不是蘇俄所謂封建社會，而是相當於西方十五至十八世紀之專制王政社會。這是在早期資本主義起來以後，國王憑藉都市力量削平封建貴族而成立的。我還說到宋代文化已達西方文藝復興水準，西方到一六〇〇年才趕上中國。然何以中國的專制主義時期較歐洲長達五倍之久呢？當初我將原因歸於三次的游牧民族之入侵，使中國社會經濟遭遇三次的後退與復原（五胡、金元、滿清）。繼而應用此一理論寫入中國社會——《文化史草書》（至六朝止）。在西方進入工業革命後，中國才落後了。中國之出路是工业化、民主化，先發展民族資本，然後進入社會主義。這也是我參加福建事變的立場。上面我說我

由歷史研究中國出路開始是無意的，即我所說「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原是用於研究文藝思潮，不是為研究中國出路而想出的。

(2) 我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又在我西游及游俄後而一變。福建事變失敗後，我逃到香港，一九三四年初被英港政府逮捕驅逐，只有向外國流亡。我經由印度、埃及而到義大利及法、英、德諸國。我看見印、埃及文明古國比中國還要殘破。而此與歐洲之繁華不僅是對照的，亦是有因果關係的。我遊覽各國博物館看世界文化之演進，各國文化霸權之興替，後來定居倫敦，每日到大英博物館補生平未讀之書。我也由報紙，參觀，及有限交游了解當時歐洲與世界之大勢。一件驚心觸目的事是自由主義在其故鄉或母國的西歐與英國，在布塞維克與法西斯蒂左右夾攻之下已經奄奄一息了。那時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為德國總理，莫索里尼於一九三五年入侵阿比西尼亞，獨裁氣燄薰天，英國人不僅對印度自背自由之原則，而且也有法西斯蒂運動起來，法國也一樣。這也無怪其然。他們崇拜權力，而希特勒似乎渾身都是權力。另一方面，英國「左書俱樂部」也吸引青年，法國還有人民戰線運動。而後來左右兩派在西班牙展開戰爭。一九三四年末，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王明邀請我到莫斯科，協助他們辦《救國時報》和《全民月刊》，宣揚全國團結抗日。抗日係我素願，當然答應，因此留在莫斯科一年有半。我除了譯述日本報紙有關侵華資料，分析日本侵華政策，撰寫抗日文章之外，當然也研究蘇俄制度和政策。蘇俄在經濟上比西方落後不足奇，使我驚奇者，是史達林崇拜，莫斯科大審，買東西動輒要排長龍不知浪費了多少時間，